



住院费跨省结算率力争五年内超70%

1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入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措施,进一步便利群众就近看病用药。

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是完善医保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突出关切的重要改革举措。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下,方便了跨省异地工作、居住群众看病和费用报销。下一步,要拓展这项惠民改革成果,从实际出发,扎实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服务更便捷、更高效。稳步提高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争“十四五”末达到70%以上。

专家:试点工作很成功

会议提到,今年前10个月,全国住院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1000万人次。对此,医药战略规划专家史立臣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之前是很难达到的。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

的前提,是要打通数据。而且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原则上执行就医地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执行参保地政策。而每个省份的报销比例都不一样,富裕的省份要高一些,不富裕的省份报销要低一些。

“所以在复杂的情况下(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执行难度很高,超过1000万人次的成绩说明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在此前几个省份的试点工作很成功。”史立臣指出。

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惠及哪些人群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主任朱世杰就此向记者指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人群在他的患者里占大约十分之一的比例,其中约有一半是跨省到子女家居住、由子女照顾或帮助子女照顾

孩子的老人,以及跨省旅居养老和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另外一半是慕名而来的外省市异地就医者,这部分主要是退休人员。

扩大门诊费用跨省结算面

会议提出,下一步,要从实际出发,扎实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服务更便捷、更高效。会议强调,要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手续方便参保人员异地备案,稳步提高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力争“十四五”末达到70%以上。

与此同时,要扩大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地区覆盖面,明年实现全国每个县都至少开通一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就此,史立臣表示,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普通门诊费用方面,各省情况都不一样。目前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情况还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推广,以惠及更多群众。

朱世杰对记者表示,他接诊的

病人中,只要在外地是有医保的,在他们医院门诊和住院都可以跨省直接结算,但是跨省结算人员在他的患者里比例还是比较低,可能患者对相关程序和政策不够清楚,也不知道有哪些地方开通、哪些定点机构可以结算以及具体怎么结算,尤其跨省异地就医主要是老年人,为此他呼吁相关流程和环节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全国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面不断扩大,2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15个统筹地区已开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北京、天津等1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统筹地区全覆盖,受益人次不断增长。2021年1~6月,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300万人次,达到338.88万人次,医疗费用8.48亿元,基金支付4.65亿元,基金支付比例为54.9%。

会议还指出,要有序开展高血

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明年底覆盖所有统筹地区。与此同时,要加快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建设,统一跨省直接结算规则和流程,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和跨区域业务协同,逐步实现医保报销线上线上都能跨省通办。此外,要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守护好医保资金这个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史立臣对记者表示,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相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医保结算更容易产生漏洞,也给监管带来了更大挑战,需要全国监管部门协同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印发《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加快推进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构建全领域、全流程的基金安全防控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据《每日经济新闻》)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难点怎么攻克?

第四批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来了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部分地方遇到改造计划不科学不合理、多渠道筹措资金难等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3日在官网公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四批)》,有针对性地总结了各地解决问题的可复制政策机制和典型经验做法。

清单聚焦了国务院大督查、审计发现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部分地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不科学不合理、统筹协调不够、发动居民共建不到位、施工组织粗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难、多渠道筹措资金难等六方面的问题。

清单列出了部分地方解决问题的举措。浙江省宁波市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库,对改造项目进行竞争比选,择优纳入年度计划。北京市实行“居民申请、先征询意见制定方案、后纳入年度

计划”的工作机制。江苏省常州市统筹考虑居民当前与长远需求,积极推动实施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同步加装电梯。

湖北省宜昌市采取“三轮征询”工作法,征求居民对改造工作的意见建议,宣传改造政策,推动形成共识。广东省珠海市、四川省成都市要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案需法定比例以上居民投票表决通过方可实施,确保“改什么”居民说了算。

此外,山东省淄博市动员居民参与改造相关施工监督,通过“眼见为实”打造“居民放心工程”。重庆市九龙坡区通过PPP模式,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市场运作、改管一体”方式参与改造,培育项目自身造血机制。福建省明确电力、通讯、供水、排水、供气等专业经营单位出资责任等。(据新华社)

一些街边鼻炎馆无行医资质

动辄上千元的高价药竟是消毒品

冬季是鼻炎高发期。不少饱受鼻炎困扰的患者,被宣传广告吸引,到街边的鼻炎馆就诊或求助线上问诊。在社交平台上,许多网民写下了自己的“看病”经历,称“花了上千元没治好”。“大街小巷的鼻炎馆安全吗”“网上卖的鼻药是骗局吗”等话题引发网民热烈讨论。

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不少鼻炎馆无行医资质,有些患者为花样百出的诊疗手段花费上万元,但实际疗效甚微。一些所谓“神药”实为消毒品或普通食品,还有不法分子借鼻药实施电信诈骗。

在重庆主城区打开一款导航软件,输入“鼻炎馆”三字便能看到周边分布着数家店面,其中不少是连锁店。记者来到其中一家进行体验。

记者向店内一位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咨询。这名工作人员用鼻镜检查记者鼻腔后表示,基本判断有鼻炎,可以免费体验一次治疗。

据介绍,该款药物还具备诊断功能。记者尝试喷过后,工作人员根据喷嚏数量和肉眼观察鼻腔即“诊断”记者患有慢性鼻炎。这家鼻炎馆除营业执照外,并未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师执业

证书。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今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未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重庆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第一次在鼻炎馆免费体验后,感觉鼻子通畅不少,店员多次推荐后买了产品,可几个疗程下来,症状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了。网民“一潭爱历史”称,自己在号称“百年老店”的某鼻炎馆先后花费4000多元没有效果,后来发现上药的员工无医疗资格,提出退钱但遭拒绝。

去年6月,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干警经过摸排发现,当地某连锁品牌鼻炎馆以多种方式宣称具有医疗功效的“抑菌膏”实为消毒产品。

今年1月,重庆市万州区法院公开宣判一起线上销售假冒鼻药电信诈骗案。2018年底至2020年6月期间,7名主犯利用网络通讯工具,开设4家公司组织人员冒充“老中医”销售鼻药,累计诈骗金额2865万余元,受骗人数达1.1万余人,涉及全国多个省份。

(据新华网)

2020年人口出生率跌破10%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相比给予补贴、优先配公租房等措施可能只惠及少数地区、少数人群,育儿假是一种更为普惠的政策。

11月23日,《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经修订通过,并正式开始施行,其中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生育第一、二个子女的延长产假六十天,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的延长产假九十天;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各十天育儿假。

据记者统计,截至当前,有近20个省份在当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中增加了育儿假,目前安徽的条件可谓最“优厚”,在子女6周岁以前,夫妻每年可各享受10天育儿假。

此外,还有的地方延长了产假、陪产假、护理假,譬如,江西和安徽都规定,对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给予男方护理假三十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和甘肃省临泽县提出给生育家庭发放补贴金;广东推出了首款对试管婴儿移植手术进行保障的保险产品;北京则成为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中鼓励生育的城市。

种种鼓励生育的措施背后,是严峻的人口出生形势。《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

在人口专家看来,2020年出生率的下降,一定程度受到了疫情因素的影响,但今年的形势或许也不容乐观。9月,安徽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透露,2017年至2021年,安徽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中国未来的出生人口规模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育龄女性人数、育龄女性结婚比例、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其转化为实际生育的比例。

育儿假重在落实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提到了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目前,多地的育儿假已相继落地。相比于给补贴、优先配公租房

等措施可能只惠及少数地区、少数人群,育儿假是一种更为普惠的政策,并且,由于夫妻双方都能够享受,也朝着“男女平等”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就曾谈及,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地要体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要让女性实现家庭和职场兼而得之。如果只是母亲休假,相当于进一步强化了母职,会带来“母职惩罚”,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

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女性的参与率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家统计局曾披露一项数据,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

对很多职场女性而言,在考虑生育问题时,一个常见的诉求是,可以兼顾生育和事业,这既是为了在工作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同时,在高房价、高昂的育儿成本压力下,女性往往不得不参与“赚钱养家”。但在现实中,“兼顾生育和事业”诉求往往面临着诸多挑战,首要的一条便是缺乏足够的人手来照顾婴幼儿,尤其是在多孩家庭中,即便有外援,职场妈妈往往也会被育儿牵扯过多的精力。

记者通过小范围的调查了解到,职场女性一个大概的感受在于,生育一孩的职场妈妈大多能继续工作,生育二孩后回归家庭的比例明显上升,如果生三孩,基本只能毫无悬念地告别职场。

如何兼顾企业利益

事实上,无论是延长产假、陪产假,还是增设育儿假,都有人担心很难完全享受得到,即便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能够享受得到,一个可能的后果在于,在三孩政策背景下,育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歧视”会加剧,而这又将进一步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一位制造业企业主向记者表示,育龄女性如果只生一个孩子,公司完全可以接受,但如果短短几年内再生二孩、三孩,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在女性职工比较集中的财务部门,一旦出现扎堆生育的情况,整个部门将难以运转。

“所以我们会控制育龄女性员

工的人数比例。”这位企业主坦言。

一位金融行业负责招聘工作的HR人士则表示,有的公司甚至根本不招聘育龄女性。虽然政策鼓励生育,但很多成本实际上是企业在承担。

另一位在怀二孩期间离职的妈妈向记者表示,她从怀二孩开始请假天数就明显增加,到怀孕后期因为身体负担的缘故主动辞了职,虽然看似给公司减少了麻烦,但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生育造成了岗位的不稳定。“所以从公司的角度看,减少招聘育龄女性可能真的是最优解。”

随着多地增设育儿假,企业可能又将额外承担更多的成本。譬如,安徽规定,职工在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今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试点范围内,可以通过将生育保险基金盈余的部分划拨给育儿假补贴。但在更长远的未来,需要另行开辟一条专门针对育儿假的参保通道,使育儿假期间的经济保障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基金来承担,政府予以补贴。

上述制造业企业主则向记者算了另一笔成本账,企业需要承担的除了员工休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期间的部分工资之外,还有社保等支出,以及因人员变动导致的工作效率损失。

“如果政府根据企业女性职工的生育情况,采取一定的税收减免措施,或者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员工,政府考虑承担更高比例的休假期薪,对企业的成本有一定的弥补,或许可以增加企业对女性生育的支持程度。”他表示。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创造有利于家庭生活的职场环境,而企业的态度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影响因子。只有切实平衡好个人、用人单位等各方的利益保障,才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生育意愿。(据《21世纪经济报道》)